

海派小说精品

(修订版)



● 吴欢章 主编

● 复旦大学出版社

海派小说精品

(修订版)

吴欢章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杜荣根
责任校对 陆宏光

海派小说精品(修订版)

吴欢章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国权路 579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省东台市印刷总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0.25 字数 504,000

1996年1月第1版 199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7-309-01566-5/I·115

定价:24.00 元

序 言

近代和现代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地带的文学艺术，常常表现出机敏多变的艺术风格，被人称为海派文艺。海派文艺的命名，虽是约定俗成，但同上海这个市称地名不无关系。上海数千年前被划为春申君的领地时，只是一片荒凉的、寂寞的渔村。宋元时，渔港辟为商港，发展了海上商运。海运又促成了上海陆岸上盐场、木棉、纺织等手工产业的发展。商贸活动使上海地区较早地走出单纯的田耕渔猎生产而逐渐地繁荣起来，到明清年间，它的城市经济形态已初具规模。19世纪，中国东南海岸被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大门以后，在列强势力的催化下，上海首当其冲地成为帝国主义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基地，民族资本企业和官僚买办企业迅速萌生和开办，出现了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经济形态混杂共处的社会经济形态，封建官僚和洋人老板既倾轧又勾结的政治文化，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都市。上海既是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中国财富的桥头堡，又是我国近代工业和市场经济生长发展的摇篮和温床，在这样一种环境条件下，上海社区文化出现了中西文化相互影响和渗透、相互融化和变异的现象。在这里华洋杂处，新生和腐朽、革命和反动，现代工业文明和传统生活秩序等各种文化类型交织、相撞，整个社区文化蕴含着十分丰富和复杂的内质。现代机器的高速运转，金融行情的瞬息万变，写字间业务的机械刻板，亭子

间生活的狭促清贫,构成了上海市民或节奏紧张、或闲适无聊的城市文化生活。适应这种多样化的社区文化生活的需要,上海等沿海城市产生了不同于中国古典文化趣味,善于翻新求异,长于兼收并蓄,富于随机应变的丰富多彩的海派文艺。海派文艺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即它很注重作品欣赏时的消遣性和消费性。这对内向性很强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来讲,未必不是一种促其求新改进的机制,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传统文化走向大众化和现代化。但由于它是特定时代中特定社区文化的产物,在发展过程中优劣因素互伴相长。某些缺点,如趣味不高,哗众取宠等创作行为,影响海派文艺的健康发展,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总结和汲取。

二

鲁迅在阐述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时指出:“艺术是由社会环境的影响所形成,在他的观念、感情、思想、意志等都不能超脱了社会生活物质基础的。”跨越近代和现代历史时期的海派文学,它们的出现决非偶然,而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形势、文化思潮影响下,一定社区生活侵染下,文学本身发展过程中的产物。海派文学由海派小说、海派诗歌,海派散文等组成。由于近现代小说成为我国整个文学活动的主体,所以海派文学的特性在海派小说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近代城市化经济社会的出现,以及西方列强的强行开埠,使上海在19世纪下半叶已成为一个向外洋和向外省开放的城市。城市人口的激增,集合起了现代文艺生产所必需的文艺消费力量,促使文学实实在在地从文人自娱之行为转变成供市民欣赏消费的艺术,职业的小说家因此成批地应运而生。西方文化生活方式的渗入和引进,使上海近代的小说家们不仅把介绍西方文明作为谋生的职业,而且也模仿和借鉴西方文学生产方式编印书刊以谋取名利,

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进行日常的文学活动。虽然清末梁启超等人鼓吹小说革命,提倡以小说为启蒙工具,而且北京的一批文学先驱也为此进行启蒙小说的创作,但我们可以说,真正改变现代文学生产方式,使小说创作成为职业行为的,是民国初期出现的海派小说,海派小说的商业性特点在文学经济形态上符合现代文艺生产的规律。

海派小说作者从一开始就并非主动地从社会教化改革的角度去从事创作活动,而是带有较强的经济谋生获利意识和抒情的主体性,所以他们的创作包含两个层面,一是迎合读者感官欣赏的需求,在为读者感官欣赏需求的消费服务中获取生存。海派作家创作的黑幕、言情、神怪、侠义、公案等小说,如《海上花列传》、《九尾龟》、《碧血幕》、《续孽海花》等,皆是因为迎合了读者的这种娱乐口味,从而拥有一定的消费市场和社会影响。二是追随创作主体的心情意绪,在吟咏情性中觅得知音,产生共鸣。如《断鸿零雁记》、《玉梨魂》、《啼笑姻缘》等小说中表现的缠绵、复杂的心境意绪凝聚着真实的人性,故而也同样获得了较大的读者群。当然,海派小说为了迎合一些读者的口味,增强作品的消费性,也出现了不少情趣不高,内容贫乏的作品,对读者的精神活动产生了不很健康的影响。

海派小说初创之时曾翻译了大量的西方小说,向我国读者介绍了雨果、歌德、莎士比亚等西方文豪的名著。在译述的同时,海派作家模仿西方小说的模式进行创作。这些有着明显的模仿痕迹的小说,在今天看来似乎很幼稚,但应该承认它在写作方法上努力引进新的技艺,新的视角,新的观念,是有助于我国小说创作向现代小说的方向发展的。新文学的兴起,使近代海派小说受到了冲击,虽然其作品在市民读者中仍有较大的影响,但他们作品的主题及对社会生活本质的认识和把握,是无法同“五四”新文学中以鲁迅、茅盾为首的新小说相抗衡的。

新文化运动兴起后,特别是其中坚力量由北京转移到上海以

后,上海的文学艺术活动更趋于现代化,海洋性文化的色彩也更加浓烈。虽然近代海派小说已日趋衰竭,但海派文化精神却在上海的新文学活动中得到了继承和很大的发展,因此在新文学长河中,又分化生长出另一支海派小说,为了有别于近代海派小说,我们把后起的海派小说称之为现代海派小说。

现代海派小说仍保持着近代海派小说追随读者日常生活,不拘一格地反映生活和表现生活,追求欣赏阅读的大众化和现代化的精神,但在内容情趣、思想品格、教化功能和审美感受等方面已与近代海派小说相迥异。现代海派小说无论在题材或艺术风格方面均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它的文学地位和作用是近代海派小说不能等同,也是其他文学流派所不能取代的。

三

现代海派小说的风格特征,非常鲜明地体现在该派的故事取材和主题立意上。严格地说,一部小说的故事题材和主题立意并不直接构成作品的风格,但当作家或作家群体的作品,在一定数量上定向地选择某几类题材,或在一定数量上反复出现某几种主题立意时,我们可以从作品题材和主题的数量性的延续中看到一种文学风格正在形成。现代海派小说区别于其他小说派别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它从20年代30年代至40年代,在小说的故事取材和主题立意上存在着若干定向的选择。这种现象从一个侧面勾勒出海派的风格形态。

上海,连同它近百年来成长发展的格局,一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现代中国的缩影。在这个城市,充满侵略和扩张主义精神的“西洋文明”和闭关锁国、沿袭传统的“中华文明”互相接触、碰撞;在这个城市,瘪三可发迹为老板,小流氓摇身变为大亨,破产农民转为产业工人,封建遗老遗少堕落为末等寓公。生活在上海的海派

小说作家,出于特定的社区文化背景和自身的素质特点,其小说创作偏嗜病态多变的都市生活,他们对现代都市中西文化的冲突,城乡之间的变迁,生活中贫富两极分化,以及各政治力量的裂变组合等非常敏感,他们从不同层次和视角反映这一历史时期的社区生活,并在作品中注入了较强的个性意识,提出了他们的见解,显示了海派小说的精神气质。

海派小说家多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和中产商家,又生活和活动于十里洋场,他们既能亲身感受到封建礼教的腐朽衰败,又直接接触到上海外国租界中带有浓厚殖民色彩的西洋文明,因此,他们小说中的人物具有鲜明的半封建,半殖民化都市社会的特征。如施蛰存的《春阳》中的婵阿姨,张爱玲的《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等女性,既是封建婚姻的牺牲品,又是金钱势力的囚徒。描写这类在封建主义和金钱势力双重奴役下人物个性被扼杀,被异化等现象,是海派小说家擅长之处。

出于特定的社区文化背景和自身素质特点,海派作家对于西方文化蜂拥而入后造成的中国文化心理的失重,对现代大工业、现代物质文明冲击中国传统的田园生产方式后,人们心理不平衡的现象极为敏感。杜衡的《怀乡病》描写长途汽车的出现对于农民世袭船业的威胁,安分守己的农民被逼劫车抢掠。施蛰存的《汽车路》中农民对于土地被征收的愤怒,对于即将出现的汽车路所怀有的喜悦和仇恨的复杂感情,正是表现了海派作家对于现代文明的困惑。

现代上海充斥着疯狂与震荡。随着租界洋场的开辟,纷至沓来的西方思潮,花样翻新的科学创造,畸型繁荣的市场经济,各种眼花缭乱的事物积聚在都市的空间,令中世纪式的中国人瞠目结舌,进退维谷。杜衡的《重来》写出了处在一个“男的变成没有感情的骗子而女的却变成没有理性的疯子的时代”的过时女子,那种既不甘退回到过去又无法适应现在的恍惚心理。黎锦明《白里帆的疑症》、

《机遇》、《夜游人》中的表现的一群在过去与现在中游荡、徘徊的灵魂，也正反映出动荡时代无法顺应历史潮流的小市民的苦闷心态。

上海是现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工业城市，是中国劳工运动的发祥地；工人阶级和各阶层的劳动者生活在富人的天堂里，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现代海派小说家注意到城市生活中贫富悬殊，苦乐不均的南北两极现象。在他们的作品中，这两极生活的对比十分鲜明。一方面他们写出了劳者之苦，穆时英《手指》中的童工翠姐儿在丝厂剥茧，那整日在滚水里浸泡的手尽是脓血，手指简直成了炸油条。虽然她们为市场提供了高跟缎鞋、茶舞服、饭舞服、结婚舞服……，但她们却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翠姐儿最终还是惨死在拿摩温的铁棍之下。《偷面包的面包师》中面包师傅辛苦工作多年，可无法使全家尝到一点面包的滋味，望着老老小小馋涎欲滴的样子，无钱购买面包的面包师只能铤而走险偷取一个，但却付出了被解雇的代价；海派小说也写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窘迫的生活境遇和心态，他们常常被突然降临的失业、失学之灾弄得惊恐万状。予且的《热水袋》写出了职员失业后家中生活的日见黯淡，《残冬》的教书匠在大年夜为筹不到买年货的钱而忧心如焚，叶灵凤《拿撒勒人》中的蔚生四处奔波筹集不到学费，又无颜面向家中乞讨，最后只能跳进混浊的黄浦江中。另一方面海派作家又维妙维肖地描写了上海的舞厅、赌场、妓院中龌龊糜烂的生活。徐讦《赌窟里的花魂》把赌客比作一朵花，细腻地描写了他们从绿色的蓓蕾到含苞欲放，以至凋谢、枯萎的过程。在这一层次生活的描写中，海派小说的描写是非常生动的，读者能够看到酒吧舞厅中的灯红酒绿，嗅到妓院烟馆里的汗臭粉香，感受到旧上海腐朽生活侵蚀人类灵魂的气息，窥见现代上海这一“罪恶的渊薮”，“疯狂的世界”。

当然，读者可从海派小说作品中所表现的对于洋场生活的厌倦烦恼情绪，看到现代海派小说家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和批评。然而，出于阶级和自身生活经历的局限，海派小说家对于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劳工运动少有深刻地认识和艺术表现。但蜂涌而起的工运浪潮和普罗文学的若干影响也多少渗入到海派小说的主题和立意中，如杜衡的《在门槛边》，《机器沉默的时候》，穆时英的《生活在海上的人们》，《南北极》等。此外，海派小说对民族抗战也作了若干表现，徐讦的长篇小说《风萧萧》就是直接表现抗日题材的作品。现代海派小说虽然对病态的城市生活表示了不满和指责，但囿于自身贫乏的生活经验和狭隘的视野，使他们的作品常流于肤浅牵强，读者很难通过他们的作品看到社会发展的主潮和推动社会进步的主导力量。

对性爱生活的描写又是海派小说作家着墨较多的一种题材。这种性爱小说大致可分为五类。一类是追随五四新文化倡导的个性解放，描写男女主人公追求婚姻自主的性爱小说，如张资平的《梅岭之春》，叶灵凤的《女娲氏之遗孽》等小说，可算是此类作品的代表作。这类作品有着一定的五四新文化气息，是“时代的产儿”。

另一类性爱题材是表现小说家自身性爱生活的情感感受，那种对于紧张的、身心十分疲惫的生活的厌倦之感，那种想回避不合人生理想的生活中令人窘迫烦恼的种种问题，力图躲进温柔缠绵的情感消遣中的生活追求，是这类海派小说常常流露出来的情趣。有时候，这种情绪常常通过对一种美好事物无可挽回的失落而表现出来。穆时英的《公墓》便是一篇典型的代表作品。小说主人公徐克渊喜欢来到没有“爵士音乐，没有立体的建筑，跟经理调情的女书记”的市郊墓地，在他母亲的墓前，他感到自己是纯洁的、愉快的、有一颗孩子的心。在墓地上，他恋上了一位非常像戴望舒《雨巷》诗中的丁香般的姑娘。然而那位名叫欧阳珍的姑娘因患肺病，在接受了徐克渊赠送的戴望舒诗集《我的记忆》后不久，终于病死了。她在纯洁的、宁静的、远离世俗喧嚣的墓地上给徐克渊留下了一片丁香般的惆怅。施蛰存的《扇》、《上元灯》等也描述了类似的故事。在这类作品中，作家们写了许多令人惆怅叹息的失恋故事，并

且都把男性所憧憬和钟情的女性，描写成既楚楚动人又病入膏肓，男性百般温情也无法挽回恋人的生命或青春年华，最后得到的只是无可奈何的遗恨和惆怅。海派小说作品中常常出现非再现性的意象人物，以及近似荒诞的情节，有人称其为现代鬼怪小说。徐讦在小说《鬼恋》中描写了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某人深夜路过静安寺附近时，竟遇上了一个女鬼，那女鬼行踪诡秘，洞察世人的所作所为，然而在白天又隐身不见。据女鬼讲，她与爱人先后投入爱国热潮，不幸朋友叛变，爱人死去，所以她便隐形于人间，于是给读者留下了一个扑朔迷离的故事。但这个虚幻的故事无疑是间接地表达了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某种评价。这类强调作者主观感受，并把意象转化成虚幻形象的现代鬼怪小说，具有一定的荒诞性，同时在主题上又有若干哲理的探索性，构成了海派小说的一个风格特点。

第三类性爱题材着墨于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爱情生活，往往写得兴意盎然，富有生活气息，心理活动描摹得尤为细腻。予且的《两间屋》写夫妻斗嘴后想和解又拉不下面子的心理活动，章克标的《结婚的当夜》描写的灵与肉的冲突，章衣萍的《小娇娘》刻画了有妇之夫与人偷情后那种负疚与爱的矛盾心理，都颇为微妙生动，创作这类作品时作家似乎更贴近读者的兴味。

海派小说的第四类性爱题材是描写受封建宗法制度庇护并在资本主义文化中滋生繁殖的寄生虫生活，他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整日沉溺于花天酒地的感官享乐。他们腐朽、糜烂的生活是30至40年代上海病态生活的映照。这类题材在海派小说中为数较多，如刘呐鸥的《礼仪和卫生》，施蛰存的《巴黎大戏院》，穆时英的《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杜衡的《红与黑》，叶灵凤的《时代姑娘》等。这类作品描写了一群青年男女在唯乐原则支配下，完全视恋爱为游戏，情场角逐，放荡纵欲的病态性心理。在创作这类作品时，虽然一些作家是怀着追新猎奇的写作心理或是追求小说销售的商业性写作态度，但作品中近似自然主义的描写也反映出洋场生活的

几分真实情况,同时也表现了现代上海资产阶级和某些市民的生活意识与审美趣味;是今天读者了解当时那一层次人物生活的一面镜子。

与此相比,海派小说中第五类关于性爱描写的小说,则格调低下,毫不足取。张资平、叶灵凤等人的某些作品,绘声绘色地,直接或间接描写各种悖于人伦之常的性逗引,性纠纷的故事。虽说这类迎合小市民猥琐、庸俗心理的性爱小说从一个侧面展现出那个时代人欲横流的生活图景,但其社会效果却是麻木和污染了读者的心灵。

现代海派小说保持了近代海派小说所具有的娱乐性,消费性的特点,其结果是导致了现代海派小说取材的特定指向,性爱小说的大量涌现就有这方面的因素。这些性爱小说有不少赤裸裸的性描写,虽然有时候作品的主题也打着反封建的旗号,标榜个性解放和个性自由,但作品的实际意向是想实现文艺阅读中的性消费。早在30年代,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艺界就对海派小说这种不良倾向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我们之所以划分出现代海派小说,是因为其题材选择和主题立意从20年代至40年代一直保持着较稳定的延续性,构成了一种明晰的文学现象和文学风格。从历史的高度来看,现代海派小说从它萌发之日起就带着严重的缺陷。它常常以商业性的写作态度为艺术质量的推进动力,这使得海派小说带有近代文学中常见的妥协性。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以后,现代海派小说虽主动汲取西方现代文化,但由于作者远离劳苦大众,缺乏对于社会本质的了解和认识,所以它仍然无力表现现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无法为读者揭示社会斗争的本质和历史进步的方向,因而缺乏启迪读者奋力改变旧生活的教化力量。因此现代海派小说只能是新文学的一脉旁支。

四

现代海派小说有与众不同的艺术表现特征,这些特征在不同的年代有若干的变化,但在流变过程中又大体上维持着风格的统一。

20年代张资平等人的海派小说,是新文学中浪漫主义小说的一部分。他们本身是创造社的成员,受创造社艺术宗旨和氛围的影响。郭沫若、郁达夫等人20年代在上海掀起过新文学中浪漫主义文学的新潮,浪漫主义文学重于抒情和歌唱理想、这无疑也促成了现代海派小说追求个性解放,追求性爱自由的故事描写。张资平的小说从主题情绪到人物事件都有一种浪漫精神,即以个性意向所指归构成故事。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我国时局已从人们要求个性解放的新文化运动初创阶段,转入到工农大众同反动政权进行英勇顽强的阶级斗争以争取解放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大劳动人民在屠刀下流血抗争,张资平却还陶醉于追求性爱自由的浪漫小说中,显得越来越落伍于时代。稍后而起的叶灵凤以新浪漫主义自诩,他追求新奇刺激,擅长以神秘怪诞手法写男女之情,其笔下的人物故事古今错综,真幻交织,使人有扑朔迷离之感。他的作品同样是一座玲珑的象牙塔,缺乏坚实的社会内容,许多小说的情趣越来越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以在《宇宙风》发表《鬼恋》而一举成名的徐讦,他的作品既有新浪漫主义特色,又带有现代主义的笔墨技巧,常编织某些浪漫故事来挖掘人生哲理,表达人生理想。从《烟圈》中对人生的探寻,到《病》中对知识分子庸人自扰及不负责任的社会风气的嘲讽;从《赌窟里的花魂》中对毁人于世的腐朽生活的剖析,到《鬼恋》中对献身于社会进步而失败的幽幽遗恨,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海派作家社会责任感的复苏,徐讦作品的艺术倾向表明现代海派小说家重新开始较为热情地关注社会。

30年代中,有几位海派小说家异军突起,他们受日本“新感觉派”小说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出于对城市文化的独特感受,开始用较冷静的态度来写上海光怪陆离的生活,尤其是写这种生活中人物心理微妙的变化和发展,被人归结为具有心理分析学派的艺术风格,如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杜衡、张爱玲等作家的小说,既细致地描写出人物的各种心理活动和潜意识,也写出了作家自己对霓虹缤纷的上海文化的感受。30年代的海派小说已经越出了浪漫主义小说的范畴,拥有了自身心理意识分析、异化感受描写,意象表现等一整套完整的艺术表现手法。可以这么说,现代海派小说在30年代已趋成熟,并完成了独树一帜的文学流派形态。在整体上表现出某些共同特征时,30年代的海派小说也呈现出作家不同的文学个性。施蛰存在《鸠摩罗什》等小说中,善于表现二重人格的痛苦,在《石秀》、《将军底头》等作品中又着重描写性爱与道德,性爱与种族的冲突,人物心理的变化发展过程叙述得颇为细腻动人。穆时英则擅长写都会中人物种种厌倦的情绪,巧妙运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相渗透的艺术手腕,把贫富两极绝对悬殊的生活表现出来,其小说《上海的狐步舞》堪称代表作。女作家张爱玲的小说同施、穆、刘等人不同,她既在文字表现上持有我国古典文学典雅雍容的气质,又糅进了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技巧,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进行人物心理描摹,构成了“新旧文字的糅和,新旧意境的交错”(傅雷语)的特殊风格。

在意象描写中,现代海派小说构成了通感表达和诗化抒写的艺术风格,穆时英笔下的女性一面吸着烟,一面“吐着青色的话语”,叶灵凤的《忧郁解剖学》用通感描写表现人物的心理感觉,“在紫色的雾围里,顾逸君度着一个交际家的水一样流动着的生活;在灰色的岑寂里,吴静娴度着铅一样的沉重的生活”。读者可从这些通感的印象中来把握作品内容的表述。由于采用了大量的通感描写,现代海派小说的章节结构中出现了诗化和电影化的结构。《夜

总会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中的诗化结构，《忧郁解剖学》中电影蒙太奇式的场景组合结构，都强化了作品的诗化表达，从而使海派小说的阅读理解越来越依赖于读者的想象。这样的艺术结构使海派小说拥有了与众不同的表现力。

总之，描写人物情绪的流动，人物内心的主观感受，又善于把客观生活加以情绪化，意象化，这些构成了现代海派小说别具一格的流派特征。

五

毫无疑问，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尤其是在现代上海文学的发展史中存在着一个海派小说流派。我们认为这是现代小说创作中一个自然形成的文学流派，它对推进现代文学的发展也曾作过一些尝试。他们的浪漫风格和心理分析的表现技巧丰富了我国现代小说的文学观念。尤其是30年代的心理分析小说，其种种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对提高现代小说创作水平是有一定意义的。作为一种海派文学精神，现代海派小说很重视并且自觉地改进小说的技法，精巧地设计小说篇章结构，并力求用意象感受、心理分析、情绪表现等手法对生活的表层和深层作某种观照。追新逐异是海派小说的内在气质。这种气质使现代海派小说不断改变自己观察表现生活的能力。因此，即使像《白金的女体塑像》，《流行性感冒》等缺乏积极内容的小说，由于艺术表现的独具一格，对于丰富现代小说的艺术技巧也不无裨益。

虽然现代海派小说在艺术表现上有可取之处，但作为一种社会性的文学创作流派，它必须受到历史的批评。由于脱离社会生活的主流，现代海派小说对于改造社会的主体力量——工农大众很不熟悉，无力正面描写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所以它的文学内容对社会进步产生的积极作用是很小的。不仅如此，现代海派小说中的

低劣作品还常常毒化读者的心灵，麻痹了人们的进步意志。当工农大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同反动势力进行殊死斗争的时候，张资平等人在肉麻地大写三角恋爱小说，还在追求个性解放和性爱自由的幌子下放肆地描写性诱惑，性苦闷，把读者的文学欣赏引向堕落和颓废。当30年代初阶级矛盾日益激化，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时，穆时英等人的小说还沉浸在对都市灯红酒绿的有闲生活进行无力的批判和粗浅的反思中，就与整个社会斗争的需要不很协调。应该说，现代海派小说尽管有一定的阅读市场，尽管他们的一些刊物销路不错，但由于这派小说主题不够明朗、积极，对社会进步几乎没有正面的指导能力，因而未能成为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主潮。

正因为现代海派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高，所以建国以来大陆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很少提及它，或干脆不承认它的存在。我们认为现代海派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流派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它对上海光怪陆离的生活作了记录和描写，也可聊备一格。资本主义城市文化中人性被扭曲的异化感，人性本体失落的惆怅感，是现代海派小说擅长的表现对象。在这个题材方面，现代海派小说作了若干的尝试和开拓，它应该被现代文学史，尤其是被现代小说史或上海文学史所评述。总的说来，现代海派小说艺术表现价值要比思想内容价值大一些。它留给我们的教训是：任何文艺创作如果不紧密联系时代生活，不注意反映社会创造主体对社会进程的态度和理想，一味囿于自己的趣味圈子，它就不可能得到时代的青睐，必然苍白无力而日趋衰落，而难以汇成时代文艺的主潮。我们编选这本选集，不仅为上海文学研究提供资料，而且希望帮助读者了解现代海派小说的风貌，希望能为当代小说创作提供历史的殷鉴，借以推进上海的文学创作。

一九九五年三月修改

目 录

序 言	1
-----	---

予 且

两间房	1
竹如小姐	11
脂粉	16
热水袋	25

叶灵凤

第七号女性	32
流行性感冒	40
忧郁解剖学	47
昙花庵的春风	55

刘呐鸥

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	67
礼仪和卫生	74
流	89

李同愈

芹芹	103
温雅先生的宴会	114

杜衡

怀乡病	119
人与女人	132